

# 天道酬勤

主编 卢新勤  
副主编 姜美珍

2004.10  
华南农业大学

# 目 录

前言 .....	(1)
<b>拓荒篇</b> .....	(6)
中国稻作学之父(记丁颖教授) .....	何貽赞(7)
土壤学界的先驱,第一任农学院院长(记邓植仪教授) .....	何貽赞(14)
开创广东近代农业科教事业(记唐有恒教授) .....	何貽赞(22)
创办岭南农科大学的爱国教育家(记钟荣光博士) .....	李心光(26)
我国现代昆虫学的先驱(记张巨伯教授) .....	陈守坚 何貽赞(34)
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记陈焕镛教授) .....	徐燕千(37)
我国现代高等林业教育、林业科学的先驱(记沈鹏飞教授) .....	何貽赞(45)
创办《农声》杂志的爱国农学家(记张农教授) .....	李华钰(52)
华南地区蚕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记杨邦杰教授) .....	唐维六 卢铿明(60)
桃李芬芳结满枝(记谢申教授) .....	游植彝(65)
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学生运动领袖(记黄承先烈士) .....	谢贤章 何貽赞(69)
<b>创业篇</b> .....	(74)
报国 献身 实践 创新(记赵善欢院士) .....	庄秋兴(75)
院士自述:我的成长经历(卢永根院士) .....	卢永根(80)
一代名师(庞雄飞院士传略) .....	梁广文(86)
我国果品贮藏保鲜学的奠基人(记李沛文教授) .....	李明启 何貽赞(89)
矢志不移发掘祖国绿色宝藏(记蒋英教授) .....	何貽赞(94)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记范怀忠教授) .....	吕剑红(100)

无籽西瓜之父(记黄昌贤教授).....	赵慧芝 李海生(107)
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记梁家勉教授).....	周肇基(114)
一腔热血治“黄龙”(记林孔湘教授).....	万 蕙(128)
我国畜牧兽医学界的先驱(记邝荣禄教授).....	姜 峰(136)
水色本正白 积深自成绿(记邵耀坚教授).....	王 瑛(142)
我国兽医药理学科的奠基人(记冯淇辉教授).....	徐 娟 陈晓梅 刘红斌(147)
华南森林生态系统和生态林业创建人(记徐燕千教授).....	李心光(154)
忠诚教育 严谨治学(记林亮东教授).....	李心光 林燊尧(160)
<b>传薪篇</b> .....	(164)
爱国心 生态情 教育梦(记骆世明教授) .....	杨运东(165)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记罗锡文教授) .....	卢新勤(172)
在科研第一线抗击“非典”、“禽流感”(记辛朝安教授) .....	徐娟 刘红斌 谭文娟(181)
木麻黄速生抗病无性系及快速繁殖技术的创立人(记梁子超教授) .....	章潜才(189)
学海无涯苦作舟(记李秉滔教授).....	卢新勤(195)
产学研结合的成功实践者(记毕英佐研究员).....	易 钢(203)
一位老教授的执著(记李明启教授).....	谭文娟(209)
育种能手 育人楷模(记李鹏飞教授).....	张海平(217)
心系祖国的归侨学子(记刘福安教授).....	刘红斌(222)
俯首甘为孺子牛(记陈杖榴教授).....	刘红斌(226)
矢志荔园谱华章(记吴定华教授).....	吕剑红(231)
事业扎根于追求和责任(记梅曼彤教授).....	叶 珊 陈家来(240)
<b>求实篇</b> .....	(247)
作风正派,懂业务的内行书记(记杜雷同志).....	何贻赞(248)
团结实干,善于驾驭全局的好书记(记黄朝阳同志) .....	谭文娟 卢新勤(253)
矢志不渝筑基础,甘为人梯洒尽爱(记殷细宽教授) .....	蔡汇民(260)
青山绿水总是情(记颜文希教授) .....	刘月秀 章潜才(268)

无悔的人生(记宋天铨教授)	易 钢 (275)
俯首躬耕,忘我奉献的一生(记刘树基教授)	郑庆顺 (282)
<b>希望篇</b>	(288)
把植物基因工程研究推向新时代(记刘耀光教授)	叶 珊 陈家来 (289)
开辟新领域 耕耘新园地(记严小龙教授)	卢新勤 (295)
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与一个学科带头人(记温思美教授)	卢新勤 (304)
昆虫学界一骁将(记梁广文教授)	张海平 (315)
生命浇注稻花香(记张桂权教授)	姜美珍 吴嫦瑜 (322)
无悔的青春(记朱兴全教授)	李文东 (328)
热土情深(记罗必良教授)	易 钢 (337)
创制新型生物农药造福社会(记徐汉虹教授)	卢新勤 (342)
师德为先 默默奉献(记洪添胜教授)	易 晖 姜美珍 (349)
“尽我的最大努力上好每一堂课”(记习岗教授)	詹文理 (353)
“课堂就是工作的主战场”(记吴鸿教授)	詹文理 (357)

# 前 言

笃学明德 躬行践履 建业自强 求精图新

## 近百年历史积淀 几代人优质风貌

——“丁颖精神”内涵及其在教师群体中的体现

华南农业大学始创于 1909 年，迄今已走过了九十五年的光辉历程。近百年岁月的艰苦磨砺，几代人毕生的不懈追求，使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孕育了优良的学风和校风，形成了一种我校师生独特的优质风貌。这种优质风貌我们称之为“丁颖精神”。“丁颖精神”就是华南农业大学精神。它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力量，是以丁颖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用他们的为人风范、理想信念、治学态度等共同构成的一种先进群体意识，是历代华南农业大学师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一种敬业爱国、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一种总体风貌。这种精神，经过老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新一代学人发扬光大，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在特有氛围的感染下，华农人秉承这种品质代代相传。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近百年办学历程，学校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高等农业教育家、科学家和其他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其中既有在战乱中艰苦创业的老一辈拓荒者，也有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传薪人，更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新一代学人。把他们的事迹进行挖掘整理，把他们的精神品质加以提炼总结，使之形成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 1997 年开始，学校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挖掘和提炼、继承和发扬“丁颖精神”的学习、教育和研究活动。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丁颖精神与华农特色”的专题讨论，在校报开辟了专栏，许多教师，特别是熟悉学校历史的老教师、前任和现任学校领导，如何贻赞、卢永根、吴维光、骆世明等，纷纷撰文，对“丁颖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最终提炼概括“丁颖精神”，给予了极大启示。近几年来，学校党委、学校行政领导亲自组织召开了近百场次座谈会，骆世明校长亲自设计调查问卷，征求学校各个方面对“丁颖精神”、对学校办学特色的观点和看法。2000 年 4 月，编委会开始筹划编撰一本汇集历代华农名人和优秀教师先进事迹的书籍，该书定名为《天道酬勤》。编委会根据教师获奖规格和层次，初拟了入选名单，

向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提出了编撰请示。这项工作得到了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时任七位校党政领导一致批示同意，并指示尽快开展该项工作。编撰《天道酬勤》，更得到了许多撰稿人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撰稿者们怀着敬仰、敬重、敬爱的心情，走近这些为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平凡而又不寻常的人，用真心，用真情写下了这一篇篇文稿。2001年10月，《“丁颖精神”内涵及表述研究》获得校长基金立项资助。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课题组和各位撰稿人终于呈上了他们的心血之作。在逐字逐句阅读、审核这些文稿中，我们的精神似乎受到了一次洗礼，思想境界似乎得到了一次提升。这些入选的人物，或许经历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对学校贡献大小不同，但他们的爱国情、事业心、使命感、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都有着太多太多的共同之处。渐渐地，“丁颖精神”的内涵在我们的思想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经过全校各方面反复酝酿、反复讨论，逐渐形成共识，丁颖精神的内涵被概括为：“笃学明德，躬行践履，建业自强，求精图新”。

这种精神，在华南农业大学历代教师群体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笃学明德”，笃学即专心好学，忠诚自己的志向，忠实履行自身的职责；明德即修德进业，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在通篇阅读了本书的文稿后可以看出，我校老一辈科学家乃至整个教师群体，共同的表现都是忠于职守，敬业爱岗。作为从教者，他们崇尚并坚持要以精湛的教艺、高尚的师德，为振兴中华农业兴办教育，为民族复兴培育英才，真正做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丁颖就经常教育师生“建立热爱农业、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的思想感情，是我们新中国农学家的起码条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丁颖教授在一次题为《农业教育与农政》的讲演中就精辟地阐述了他对举办农业教育的几个基本观点。举办农业教育一是为了振兴农业，复兴农村，安定农民生活；二是为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问题；三是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他针对当时一些农科毕业生害怕艰苦不愿到农村的现象，勉励农学院毕业生要以“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而摆脱一切，赶赴农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农科专业人才更好通向农村，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建设，他十分重视对师生进行学农、爱农、献身农业的思想教育。

丁颖教授还是修身明德、敬业奉献、团结合作的典范。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人所共仰。他一生善于和乐于与人合作，以诚相待，不抱门户之见，虚心了解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敦厚淳朴，谦虚诚挚，平等待人，与农民为友，关心下属。他对党和人民的重托总是认真负责，不辞劳苦，奋力完成。他晚年身患绝症，不顾年老体衰到北方稻区进行现场考察，临终前20天，还到山东指导水稻生产，最终病倒在临沂。“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我校还有许多著名科学家都以他们高尚的人品和对农业科学的真诚热爱，在师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如沈鹏飞教授性情豁达，严于律己，善于团结师生；李沛文教授胸怀坦荡，具有强烈的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情怀；范怀忠教授心胸博大，与人为善，做人做事，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从不扬己之美，彰人之丑。老一辈科学家

笃学明德的品行，直接教育、影响和感染了他们的同事和学生，成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使得笃学明德，学农爱农，矢志不渝，敬业奉献也成为广大中青年教师共同恪守的行为规范，涌现出一批师德高尚的中青年教师。

“躬行践履”，躬行即亲力亲为，践履即亲身实践，脚踏实地，求真务实，这是“丁颖精神”的又一显著特征。老中大、老岭大的农科教授们，每逢在水稻插秧、生长中期调查、收稻等环节，都会卷起裤腿和学生、农民、临工一起下田耕作。抗战时期，日寇兵临城下，广州即将沦陷，可丁颖教授临危不惧，仍在稻田里记录实验数据，并组织学生转移种质资源材料；邓植仪教授曾经带领学生进行分县土壤调查，利用寒暑假的空余亲自带队在广东 40 多个县实地研究，每个县都记录了满满一册数据；蒋英教授早在 30 年代就率领着科学考察队，风餐露宿，碾辗跋涉在 60 多个县的深山老林或悬崖峭壁之中，整整六个年头没进过家门，采集到植物标本 25 万份，发现了许多稀有的珍贵植物；蔬菜育种学家李鹏飞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常年累月田间地头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直至 80 多岁高龄，还亲自下田，选育出一个个抗青枯病的优良番茄新品种。

老一辈科学家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注重实践的学风，极大地影响和感染了全校师生员工，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深入实践的感人事例一直在学校里广为传诵，他们头戴草帽，卷起裤腿，不怕日晒雨淋深入田间地头的形象仍映在人们的脑际。新一代中青年教师以老教师为榜样，注意深入生产实际、深入农村、农民和农业企业中，亲自调查研究，观察实验，获取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把科研选题立足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上，不遗余力地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李秉滔教授为了保持学校在植物分类学上的优势地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共发现植物新种新属等新分类群 255 个。辛朝安教授，常年深入全省各大养禽场观察实践，调查研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禽病诊断经验，储备了解决禽流感等难题的一些关键技术，在抗击“非典”和“禽流感”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罗锡文教授数九严寒天、炎炎酷暑日坚持在湖南做甘蔗地深松试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严小龙教授、刘耀光教授、张桂权教授、朱兴全教授、徐汉虹教授等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他们所在的实验室，在无数个节假日，总是能看到灯光下他们工作的身影……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我校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如今，我校许多中青年专家、教师和科技人员秉承躬行践履、深入实际的优良传统，正活跃在广东许多大型果场、菜场、养鸡场、养猪场、林场、林木加工厂等生产第一线。

“建业自强”，即建功立业，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振兴祖国农业科技教育事业而拓荒创业，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建业自强”，源自于孙中山先生的谆谆训勉和切切期望。华南农业大学前身作为中山大学的一部分，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融入了学校的历史传统中。1924 年 6 月 21 日，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校长就职礼暨师范、法学、农学三院学生毕业式，孙中山大元帅派总参议胡汉民代表他致训词：“学海汪洋，毓仁作圣，大学毕业，此其发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勗哉诸君，努力自强。”我校老一辈的学科开创者和奠基人，都曾在原国立广东大学农学院或中山大学农学院工作或学习过。岭南大学农学院，

其创办者也曾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应邀到岭南大学视察和演讲，极大地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爱国师生。他们牢记孙中山先生的训勉，教书育人，投身社会，“为社会福”，“为邦家光”，而“建业立名”，而“努力自强”。这些老科学家，大多曾赴国外留学或在国外工作过，他们满怀科技教育救国的梦想，满怀建功立业的志向，回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教学科研条件，他们无怨无悔，以创业拓荒为荣，以艰苦奋斗为乐，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亲手创办了一批重要科研机构（研究所、研究室、实验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成为我国稻作学、土壤学、植物分类学、昆虫学、果品贮藏保鲜、兽医学、植物病理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如邓植仪教授和彭家元教授，1928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土壤研究所，并于1935年率先在全国招收土壤学研究生；丁颖教授享有“中国稻作学之父”的美誉；陈焕镛教授早年创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植物研究所，沈鹏飞教授和蒋英教授等使我校长期以来在植物系统分类学和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调查和利用的研究上一直保持较强的优势；蒲蛰龙院士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即致力于赤眼蜂等寄生虫防治甘蔗螟虫等害虫，被称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赵善欢院士，早在上世纪30年代，率先涉足植物杀虫剂的研究，被称为“研究杀虫植物的开山祖”；我国植物病理学奠基人之一范怀忠教授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发现并鉴定了世界性的细菌新病害甘薯瘟和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措施；李沛文教授毕生从事南亚热带果蔬贮藏保鲜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黄昌贤教授早在1938年就利用激素和秋水碱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无籽西瓜”，被称为“无籽西瓜之父”；林孔湘教授对柑桔“黄龙病”的攻克，邵耀坚教授对南方水田行走机构的研究，冯琪辉教授对动物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邝荣禄教授对南方禽病流行和防治的研究等，都为我校开展具有南亚热带特色农业科学研究与教育，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

“建业自强”所蕴涵的创业精神、拓荒精神、奠定基业的奉献精神，不仅在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得到明显体现，新一代华农学人在老一辈科学家开创事业的基础上继续耕耘的同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科学研究和教育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新的创业拓荒活动，开辟新的学科领域，创办新专业，创办科技实体，创建新的研究所、新的生产实习基地等等，都是继承和发扬“建业自强”精神的具体体现。

“求精图新”，即精益求精，探幽入微，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追求新知，占领科学前沿的探索精神。以丁颖为代表的各学科奠基人和我校许多在科学上颇有建树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有所发现、创造、创新，为学科发展作出独创性的贡献，都与他们坚韧的探索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如卢永根院士在遗传育种理论方面取得的突破，赵善欢院士在昆虫毒理学、植物杀虫剂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的贡献，庞雄飞院士在昆虫生态和种群动态控制方面取得独创性成果等，都是求精图新，严谨治学，勇于探索精神的具体体现。

科学事业的薪火相传，科学传统的代代承接，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孕育和造就了



更多中青年科学家致力于学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出国留学学生和在国内培养起来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他们或被祖国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所召唤，回到国内寻求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或对学校这种特有精神和氛围的认同和仰慕，汇聚在华南农业大学，既继承前人的事业，又不拘泥于陈规，一方面继续做强做大传统学科，另一方面不断开辟新的学科领域，以再次创业的勇气和精神，或者在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几代人携手合作，或者由新一代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领衔团队，奋力攻关，不断提高学科建设水平。我校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在“十五”期间，挑起大梁，担纲主持国家 973 项目和 863 计划、国家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成为我校科技创新、学科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灯塔，具有团结和凝聚人心的强大作用和规范组织成员思想行为的特殊效用，提炼总结“丁颖精神”，学习宣传“丁颖精神”，使“丁颖精神”成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传承“丁颖精神”，弘扬“丁颖精神”，使“丁颖精神”成为营造良好学风和校风的精神源泉，正是我们开展“丁颖精神”内涵及表述研究和编写《天道酬勤》一书的初衷和意愿。

由于对历史资料把握不够全面详实，书中收录人物，难免有遗漏之处；由于时间仓卒，精力水平有限，对文稿的修订审核，难免有不当之处，在此一并恳请谅解。我们深信，随着对历史挖掘的不断深入，随着学校事业的发展，各学科优秀拔尖人物、新时代先进人物的不断涌现，《天道酬勤》还会续写更精彩的故事。

感谢何贻赞等老同志在庆祝建校 90 周年期间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感谢在开展“丁颖精神与华农特色”专题讨论中认真撰稿的所有同志，感谢所有为本书编写付出辛勤劳动及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人们！

“丁颖精神”内涵及表述研究课题组

《天道酬勤》编委会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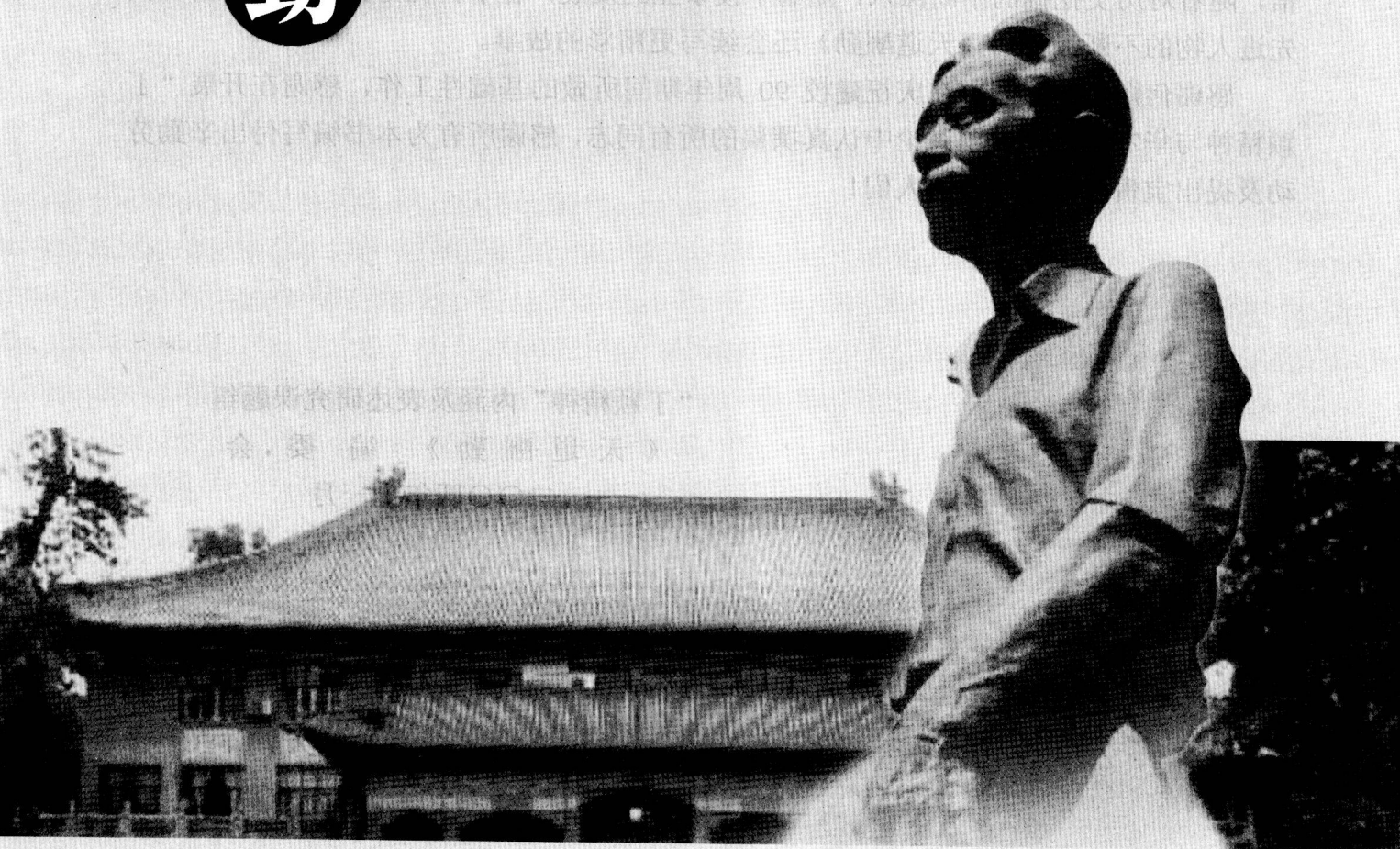
道

酬

勤

## 拓荒篇

以丁颖、邓植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老科学家，大多曾赴国外留学或在国外工作过，他们满怀科技教育救国的梦想，满怀建功立业的志向，回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教学科研条件，他们无怨无悔，以创业拓荒为荣，以艰苦奋斗为乐，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亲手创办了一批重要科研机构（研究所、研究室、实验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成为我国稻作学、土壤学、植物分类学、昆虫学、果品贮藏保鲜、兽医学、植物病理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 中国稻作学之父

——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丁颖教授

何貽赞

丁颖教授(1888~1964)，字竹铭，别名君颖，是我国现代稻作科学的奠基人，高等农业教育先驱，中国共产党员。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而且蜚声国外，曾被授予德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他抱着振兴祖国农业的坚定信念，毕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长达40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开拓、发展我国农业科教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 爱农学农矢志农业

1888年11月25日(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廿二日)，丁颖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谢鸡乡硕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饱受乡村封建恶势力的压迫，故自幼就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当时我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不聊生，衣食严重不足，每年要进口大量洋米，他对此感到万分忧虑。进入中学后，接受了孙中山先生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关心时政，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中学毕业，他决意报考农科，立志为振兴祖国农业解决民食而奋斗。

1910年，丁颖考进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1912年，又考上公费留学日本学农。在日本，他忍受着祖国被侵略的凌辱，社会轻农观念和家境清贫的困扰，虽数度辍学，仍三次东渡扶桑学习农业科学，先后达9年之久，直至1924年36岁时才完成学业回国。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第一个攻读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学期间，他不仅牢固掌握了丰富的现代农业科学理论，而且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并形成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回国后，他坚信要振兴祖国农业，必须扎扎实实抓好农业教育、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推广三项工作。他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终生。

## 中国稻作学之父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 40 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包括形态、解剖、生理、生态、遗传、育种和栽培技术等方面。他深入研究水稻生态，并以之为核心，结合生产实际，联系稻种起源、分类、区划和遗传育种等基础学科，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国内外许多农学家对丁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稻作学界就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1989 年日本渡部武主编的《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一）水稻品种选育硕果累累。要提高我国粮食产量，结束吃洋米的历史，丁颖认为，必先要解决水利、肥料、品种和栽培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农业生产，忽视水利建设，农民又无钱购买肥料，这一现实使丁颖意识到，培育良种才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增产办法。所以他把大部分的力量都投放在培育良种工作上。1927 年便走出校门，在茂名县公馆圩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试验基地——中山大学南路稻作育种场。其后，又陆续建立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沙田、东江、韩江三个试验分场。

在品种选育工作中，他鉴于有机体与环境条件是一个统一体，认为不能离开栽培条件来研究品种问题，也不能离开品种来研究栽培问题，任何新品种的选育，都要认真考虑具体地区和不同栽培条件下的要求，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他指出，水稻增产归根结蒂是改良品种，充分利用栽培条件或改进栽培条件，充分发挥种性的问题。故在栽培条件未得到改善之前，欲求增产，对原有适于当地环境条件的农家良种的提纯复壮和利用是非常重要的和有效的。

根据这一正确认识，丁颖充分利用各稻作试验场，征集当地品种，积极开展水稻纯系育种工作，从优良农家品种中选出优良品种系统。经过多年努力，先后育成优良品种有“竹占 1 号”、“东莞白 18 号”、“白谷糯 16 号”、“黑督 4 号”、“齐眉 6 号”等共 84 个良种。

在进行纯系育种的同时，丁颖对杂交育种也很重视，为了找出一些更能抵抗恶劣环境条件的新品种，他进行了一系列利用野生稻资源与栽培稻进行杂交和品种间杂交育种试验，从野生稻的自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著名新品种“中山 1 号”。用系统育成品种与印度野生稻杂交育成的优良品种有：“东印 1 号”、“银印 20 号”、“竹印 14 号”等。他是我国第一个用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育成新品种的稻作学家，开创了利用我国丰富的稻作遗传资源的新途径。在杂交育种工作中，丁颖还把很大力量放在早熟、矮秆和比较大穗的品种杂交育种上，“逻黑 7 号”、“竹印 2 号”、“金竹 17 号”等著名品种，就是由这些系统选育出来的。他用杂交育种法育成的新品种共有 26 个。

丁颖为探求水稻品种产量潜力，曾进行过大穗种的育种工作。1936 年，他用华南水稻栽培品种“早银占”和印度野生稻进行人工杂交，在其后代选出每穗几百粒以至千多粒的系统，俗称“千粒穗”。这一成果对发掘水稻高产潜力的研究很有启迪意义，引起了国内外稻作科学界的极大注意，但丁颖很快就把“千粒穗”这项研究工作搁置下来，因为他认为“千粒穗”种性不易稳定，加上当时农民耕种水平落后，难以解决在生产中

需要具备的条件，故在生产上价值是不大的。这充分体现了丁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关心农民切身利益，不图虚名的崇高品德。

丁颖对水稻育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先后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1933）、《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1936）和《水稻纯系育种法的研讨》（1944）等专论。他在水稻选育工作中创立的水稻品性多型性理论、区制纯系育种法等，为水稻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品种提纯复壮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论证了我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这是丁颖经过数十年深入研究取得的又一辉煌成果，他于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在他去世14年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后，就开始对我国栽培稻种起源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他对国外某些研究资料随意肯定中国栽培稻种来源于印度，或指称在中国栽培了数千年的粳稻为日本型等，提出了严肃批评，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实事求是问题，而且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过程的研究有重大关系。

我国稻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过去对它的发祥地、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如何，却茫然无所知。为了解开这一谜底，丁颖经过30余年潜心研究，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物学、人种学、植物学暨地理分布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他在我国华南热带地区发现有多年生野生稻、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等，他根据对这些野生稻的地下茎、植物形态和染色体数等多方面的研究结果，认定多年生野生稻是亚洲栽培稻种的祖先；他还根据这些野生稻广泛分布在华南地区，而未见于北方，因而肯定了我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南方。日本的稻种是我国传去的。这一诊断澄清了中国稻种来源于印度和我国粳稻是日本型等谬误。

丁颖还根据我国稻种栽培历史过程和分布情况，并以生态学、生理学、形态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了栽培稻种的演变形成和各种类型的亲缘关系。他的这些研究结果，使人们对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有较系统的认识，为稻作分类、品种选育和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深入开展水稻品种的生态特性研究。早年，丁颖在广东曾进行过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种试验，阐明了不同品种在正常和异常气候条件下生长发育与光、温条件新的关系，为广东地区掌握适宜播植期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晚年，此项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从技术性研究进到规律性研究，从专题研究发展到综合研究，首创把自然生态试验与人工控制试验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由他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是一项我国少见的科研大协作。他组织了国内12个科研单位协同在8个省区设8个试验和两个附点，观察研究了我国各稻区不同纬度、海拔、季节分布的有代表性的157个地方品种的生长发育特性变化与光温条件的关系，发表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研究》一文，为地区间引种、选育种、栽培生态学等方面奠定了科学基础。这项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丁颖在 40 年的稻作研究中，除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外，在栽培稻种的分类，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水稻栽培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具有独创性的。他还积累了大量稻作试验基础资料，如他征集的国内外水稻品种就有 7000 多个，还有大量的野生稻。他的科学论著丰硕，除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1961 年农业出版社出版）外，先后发表科学论文 140 多篇，其中一部分已编入《丁颖稻作论文选项集》（华南农学院编辑，1983 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丁颖开创性的稻作研究和丰硕成果，对水稻生产和稻作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愧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 高等农业教育先驱

丁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民教育家。为振兴中华农业办教育是他的办学指导思想，为农业生产服务是办学方向。他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探索中国式办学道路，为促进学校朝教育中心研究中心方向发展，为创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培养大批高素质农业专门人才，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推动了高等农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为振兴中华农业兴办教育。这是丁颖毕生执着的追求。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丁颖在一次题为《农业教育与农政》的讲演中，精辟地阐述了他对举办农业教育的几个基本观点：一是为了振兴农业，复兴农村，安定农民生活；二是为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问题；三是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他针对当时农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农事职业教育应“教养农民子弟，以其工值当学费，以其工值供食用，教了他们，他们马上有所应用”的面向农村，招收农村青年，实行勤工俭学，毕业后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办学方针。

过去不少青年，受轻农思想影响，不愿报考农科；农科毕业后又害怕农业工作艰苦不愿到农村，并常有“跳槽”现象。丁颖对此甚为不安。他常勉励农学院毕业生，要以“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而摆脱一切，遑赴农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农科专业人才更好通向农村，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建设，他十分重视对师生进行学农、爱农、献身农业的思想教育，反复强调农业教育必须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学校的任务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接见华农学院毕业班学生时，曾语重心长地勉励同学们“以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来承担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和建设的任务。”“一定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生产，牺牲目前的个人利益，献身于长远的农民群众的利益，以求达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目的。”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农学家的起码条件”对在农业战线工作的毕业生，丁颖也是关怀备至，下乡考察指导生产时，总忘不了要探望鼓励他们，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干劲十足，为农业建设作出贡献时，感到无限欣慰。

丁颖于 1924 年从日本回国后，从未离开过农学院。在抗战极为艰苦的 1940 年，中山大学决定从云南澄江迁回粤北时，他临危受命，出任院长，带领全院师生，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迁到湖南宜章县一个偏僻小山村栗源堡。他坚毅沉着地克服诸多困难，支撑着

农学院，多方设法延聘一批知名教授来院任教，加强了师资队伍，又先后创建了北江稻作试验分场和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改善了办学条件。许多有志献身祖国农业的青年，慕丁颖之名，纷纷前赴深造，使农学院在困境中得到复苏、发展。

1949年，他以热切盼望黎明的心情，不顾个人安危，同情、声援中山大学师生反抗国民党迫害的正义行动，积极参加教授求生存和护校斗争。他曾代表中山大学教授会向国民党教育部请愿，要求改善教工待遇；1949年“7.23事件”后，他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师生的活动；广州临近解放，他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把中山大学迁往海南岛的阴谋。丁颖第二次出任院长，是在广州解放初期。面对已经元气大伤的农学院，他义不容辞，接受了党和政府的重托，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团结全院师生，出色地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艰巨任务，使农学院在1952年有条不紊地进行了院系调整，建立了华南农学院，他是首任院长。在职12年，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改革，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做了大量工作，使华南农学院进入了全国知名大学行列，为广东高等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过数十年的教育实践和新旧中国的对比，丁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是“此路不通”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业教育才能得到迅速发展，振兴中华农业才能得到实现。

（二）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教育道路。丁颖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从思想到实践都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上。他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我国国情，以开拓精神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早年，他对当时打上了帝国主义“洋化教育”和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烙印的高等教育深为不满，他一贯反对盲目地原封不动地照搬外国的东西，严肃批判“全盘西化”的教育方法，认为是“仆从式、殖民地式”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情况下，他一方面热情赞扬和支持师生学习苏联教学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肯定了诸如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加强思想教育与教学实践环节等方面的改革，但同时也提出不能脱离我国实际，全盘照搬苏联高校那一套，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之中。这充分体现了一位人民教育家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

1、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缺乏现成的农业试验研究资料，丁颖又不甘于抄袭外国的材料，他认为，我国是农业古国，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蕴藏着许多科学道理，且我国农业环境条件复杂，作物品种类型繁多，生产现场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库。他翻阅了大量古农书并虚心请教农民，以搜集资料，吸取经验。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经验不等于科学理论，不能完全满足编写教材的需要和达到科学应用于生产的目的。于是，他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稻作试验研究工作，以其研究成果充实教材。1961，由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就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稻专著。

2、力促学校朝教育中心科研中心方向发展。丁颖任教伊始，就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生产（推广）三者的结合，重视系、科与科研试验机构的同步发展，以推动学校朝两个中心方向前进。从1927年春开始，他就以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精神，深入农村，陆续创建了6个稻作试验场。这些试验场的建立和工作的迅速开展，既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又密切配合了教学，培育了科教队伍，直接推动了水稻科学的发展和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农学院稻作学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实践证明，这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成功办学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丁颖这一成功经验还对开创广东省农业科研事业新局面，推动农业院校与农业科研机构同步发展，促进“三农”（农业厅、农科院、农学院）协作，发挥过重要作用。1952年底，华南农学院刚建立，就向广东提出与农业厅共同筹建华南农科所的建议，该所成立后丁颖兼任首任所长，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兼任副所长，多数系主任兼任该所系主任。这就密切了院、所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3年，经丁颖建议，由中国农科院、广东省农科院和华南农学院联合组成中国水稻生态研究室，依托于华南农学院，开展全国性水稻生态研究，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农学院朝两个中心方向发展。

经过丁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至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农学院已成为有8个学系和试验研究机构较齐全的农学院；华南农学院成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国内少数设有农、林、牧、蚕桑、农机等多专业和多学科研究机构的农科大学。

3、树立良好学风。解放前，学风不正，学习纪律松弛，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是某些大学的一大弊端。丁颖对此深为忧虑，认为良好学风是衡量办学是否成功的标志，对农业院校尤为重要。数十年来他始终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格的教学风格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影响教育后辈。解放后，他的严格教学风格还体现为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关切。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丁颖是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提出“农学是应用的科学，要把所学应用到某方面去，我们的学，我们的研究自不能离开某方面而独立存在。”解放后，这一观点深化了，他在《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农业科学理论联系生产实际的问题也是理论与技术统一、当前与长远统一的问题。”为此，他要求大家“不应该离开生产实际问题来进行理论研究，也不可能离开理论要求系统地、完整地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40年来他是这样，一直围绕生产问题，深入田间，亲力亲为，开展科学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培育了百多个优良水稻品种，创立了系统的稻作学理论。在他的晚年，虽年逾古稀，又身患绝症，仍坚持到稻区考察和指导生产。他总是用实际行动来引导后辈养成深入实际，亲力亲为的良好学风。

4、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丁颖深知建设一支热爱祖国农业，有学科带头人的高素质的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农教育的关键。对此，他一方面聘请一批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学术造诣专深的知名教授来院任教，一方面想方设法培养青年教师。



早在 1935 年，他就注意推荐一些品学兼优，对农业科学确能专心研究的青年教师出国深造。解放后，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教育工作者的作用 and 任务》与《如何领导青年教师向科学进军》等文中，强调对老师培养既要注意思想领导和思想品格的培养；又要注意包括学术思想、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和工作技能的专业领导和培养。他一再要求党组织给教师以有计划的共产主义教育；又要求老师要自觉地在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农学院逐渐形成了一支有良好学风，敬业乐业的师资队伍。

###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

这是丁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逝世后，党和政府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经周恩来总理审定的首都各界公祭丁颖同志大会的悼词表彰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在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的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丁颖一生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在旧中国他不止一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以布衣淡食为荣。新中国成立后，他便热切盼望参加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教育，1956 年，在华南农学院老一辈教育家、科学家中，他第一个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对党和人民的重托总是认真负责，不辞劳苦，以拼搏精神去完成。他晚年虽身患绝症，仍念念不忘工作，抱病到北方稻区进行认真的现场考察，临终前 20 天，还到山东指导水稻生产，是病倒在临沂后，被护送回京医治无效于 1964 年 10 月 14 日辞世的，享年 76 岁。丁颖高尚的科学家道德情操，人所共仰。他一生乐于和善于与人合作，以诚相待，不抱门户之见，虚心学习不同学术观点。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向农民和书本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对知识的追求永不停步，永不满足，虽年过古稀仍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

他又是一个真诚的劳动者。他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学院院长，仍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敦厚纯朴，与农民为友，关心下属，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诚挚，平等待人，从不摆领导和专家架子。在学样，不论教师还是工友学生，与他交往都感到无比亲切。正如他的得意门生著名水稻专家吴灼年教授所说：“在丁颖教授身上汇集了我国许多科技界的优良学风和传统的民族美德。这是祖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很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华南农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为缅怀丁颖教授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的杰出贡献，设立了“丁颖科学基金”和“丁颖教授纪念室”，建立了丁颖铜像，先后编辑出版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1983）和《丁颖邓植仪农业教育论文选集》（1992）。1989 年广东科学技术协会设立了“丁颖科技奖”，这是广东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第一个科技奖；1990 年邮电部还发行了一枚农业科学家丁颖纪念邮票。这都是为了继承他未竟事业，弘扬他的光辉业绩和无私的奉献精神。